

由实而虚：唐朝肃代之际中书令的职权演变

黄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开元、天宝年间,中书令政治资望极高,备受皇帝宠信,在玄宗朝政务处理过程中俨然“首相”姿态。安史之乱以后,肃宗朝廷草创,当时并无实际资望和地位可拜中书令者,朝廷政务遂由中书侍郎加相衔者处理,中书令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勋之臣先后加中书令衔,中书令成为勋官的趋势相当明显。大历二年(767),代宗对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品秩的调整完成了中书令“退出中枢”的职权转换。从玄宗到肃代之际,中书令职权“由实而虚”的演变过程通过肃宗即位以来朝廷中枢的人事安排得以展现,这是肃代两朝统治者不断进行“权利博弈”、调整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唐朝;肃代之际;中书令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25.03.009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25)3-0047-07

中书令是唐朝三省体制下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对唐朝政务运行的作用自不待言。事实上,唐朝的三省长官职权与地位在实际政务运作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尚书令与中书令的变化尤为明显,历来为治史者所关注。欲探究开元、天宝年间至肃代之际中书令的职权演变,有必要对唐前期的三省体制下中书令的地位变化做梳理。

关于唐朝中书令的职掌,《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条云:

中书令二人,正三品。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凡大祭祀群神,则从升坛以相礼;享宗庙,则从升阼阶;亲征篡严,则使戒敕百僚。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则宣而授之。凡册太子,则授玺、绶。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则授之于记事之官。^{[1]272-275}

《唐六典》对中书令职掌的记载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基本相同,说明唐朝中书令之职掌在诸史家中的认识并无大异,这恰是唐朝中书令职掌之重的表现。纵观唐朝前期的政治史,三省长官在朝廷地位最为显赫的并非中书令,而是尚书令或侍中。一方面,唐初的武德年间,尚书令的地位异常崇高,直至太宗即位后尚书令长期阙置,尚书左、右仆射就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另一方面,门下省在三省体制的政务运行机制下起到了对日常政务“审署申覆”的关键作用,在尚书令地位下降的同时,侍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至高宗晚年,皇帝对时任中书令薛元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信任,《旧唐书·薛元超传》载:

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临行谓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为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2]2590-2591}

而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以后,侍中裴炎因于东宫平章事之功而拜中书令,迁政事堂于中书省^{[3]4247},改变了自太宗以来群相于门下省议政的传

统,这也标志着中书令地位的迅速崛起。

关于唐朝三省体制的演变,刘后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指出,随着高宗、武后以来政治形势的日趋复杂,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中书省的核心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原来的三省制衡体制逐渐被打破。刘后滨认为,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标志着唐朝中书门下体制的正式确立。在中书门下体制中,中书省的作用与职能逐渐突破了原来所谓“起草奏章”的局面,以中书令为首的中书省长官逐渐走向朝廷政务的前台^{①[4]}。任士英也指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中书令的政治地位全面上升,对邦国庶务的处理权扩大,主导着玄宗朝政务的处理,而唐玄宗在朝廷要务上也尤其重视中书令的意见。另一方面,玄宗时期中书令地位的优越是建立在皇权扩张的前提下,即中书令对庶务的处理需要与皇权意志保持一致。任士英列举了玄宗朝废储一事与中书令人选的更易,说明中书令必须服从皇帝意志,中书令的职权扩张是皇权对宰相和整个官僚系统进行支配的体现^{②[5]56-70}。因此,中书令在开元、天宝年间地位的上升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朝政处理过程中却鲜有中书令的影子,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功勋之臣和地方节度使却先后被加中书令之衔。在玄宗朝才能堪任、皇帝器重的中书令却在安史乱后的动荡政局中“退出中枢”,这样的政治现象颇值得深思。黄永年先生对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进行了研究,认为李辅国和张良娣对肃宗灵武即位影响甚大,但这也是肃宗自太子时期起缺乏朝臣支持的必然结果,由此在肃宗朝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朝臣与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现

象,而经过代宗时期的整顿才出现了比较稳定的中枢政局^{③[6]346-367}。目前未见有对安史之乱以后的中书令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不过近年来有不少从文学层面对中晚唐时期士人与宰相进行研究的成果,如王凯、辛志英分析唐朝深州张鷟及其后人面对不同的政治形势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不同的仕进心态,充分说明了中晚唐政治形势的变化^[7];此外,黄大宏、梁明玉对常袞诗文中的窜乱行为进行辨正,其中涉及大量代宗朝史事,以此证明了常袞诗文的史料价值,这对了解唐朝肃代之际的政治背景颇有裨益^[8]。此类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本文拟从玄宗时期中书令的任职情况着手,解释肃代之际中书令“退出中枢”的表现与政治背景,祈求方家斧正。

一、“首相独重”:开元、天宝年间的中书令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中书门下体制形成并且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书省在朝廷政务的地位赫然上升,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的中书令自然也成为了“首相”。中书令在朝廷中枢的独特地位使之成为拜相的重要标志,开元、天宝年间的中书令自然也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中书令的易位除了朝廷统治者出于人事更替的需求外,更隐含了朝廷大臣之间的权位之争。同时,玄宗时期的中书令几度易名,《旧唐书·职官志》“中书令”条有注曰:“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为中书令。天宝改为右相,至德二年复为中书令。”^{[2]1848}中书令的易名是朝廷基于政治文化需要而做出的选择,其重要性与地位在玄宗一朝达到了极致。基于此,需要对唐玄宗时期中书令的任免情况进行简单梳理。

表 1 玄宗朝任中书令(包括紫微令和右相)的基本情况^④

姓名	在任时间	任前官职	去职原因
张说	先天二年(713)七月至十二月	尚书左丞	为姚崇所构
姚崇	开元元年(713)十二月至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结党营私,为上不悦
张嘉贞	开元八年(720)五月至开元十一年(723)正月	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与张说不叶,其弟赃发
张说	开元十一年(723)正月至开元十四年(726)四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为宇文融、崔隐甫所劾
萧嵩	开元十七年(729)六月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与韩休不和,上颇不悦
张九龄	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为李林甫所忌
李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至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死于任上
杨国忠	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至至德元载(755)六月	蜀郡长史知剑南节度使事	马嵬兵变被杀

表 1 较为清晰地呈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中书令一职的任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玄宗

朝中枢政局的走向。首先,开元、天宝年间担任中书令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望与功绩,除了杨国忠因受玄宗恩宠而得以在李林甫死后代右相外,其余任中书令前均加同平章事衔,这说明中书令为朝廷要职,非任宰相者不能轻易授之。其次,姚崇、张说、萧嵩和李林甫四人均以兵部尚书并同平章事衔迁为中书令,这一方面反映了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尚书六部完全沦为政务执行机构,另一方面更突出了玄宗时期边境形势的恶化。张说、萧嵩等均以宰相身份遥领地方节度使,足以说明此时唐廷面临的边患问题之严峻。再次,除杨国忠是因兵变被杀以外,其余任中书令者去职原因无一例外都与政治权力斗争密切相关。需要强调的是,李林甫虽死于任上,但在天宝后期杨国忠得宠以后也设法排挤李林甫,史载“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9]7031}。中书令职权之大、地位之崇无疑成为朝臣竭力攀升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玄宗朝中枢的政治风气也愈加腐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外,需要结合上表诸相任中书令时的政治表现分析中书令在玄宗朝的政治地位。以姚崇为例,起家于武后圣历年间,深得武后器重,后又参与“神龙政变”,为李唐宗室的光复立下功勋,因此睿宗即位后,“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2]3023},其政治资本相当丰厚。玄宗即位后再度起用姚崇任紫微令,姚崇的政绩也相当突出,尤其是在应对开元初年的蝗灾过程中,姚崇当居首功,深得玄宗信任。《旧唐书》本传记载:“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2]3025}此外,张说在接替张嘉贞为中书令后,便立即着手玄宗的封禅事宜,面对源乾曜等宰相“不欲封禅”,张说力排众议,“及登山,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2]3054}。显然,张说借助封禅一事进一步扩张了自己在朝廷的政治地位。不仅如此,张说还否定了宇文融括户置使的建议,甚至到了“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的地步,当然这也为宇文融、崔隐甫等弹劾张说、停中书令一事张本^{[2]3054-3055}。无论是姚崇亦或张说,这些开元名相都以“首相”身份活跃于玄宗政坛,甚至不惜进行各种政治权力博弈,更遑论李林甫、杨国忠等“唯权势论”之徒了。因此,开元、天宝年间中书令的政治地位更像“首相”“独相”,远非贞观时期三省六部体制下的中书令可比。中书令地位的上升既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也是玄宗朝臣不断进行政治权力博弈的结果,这也为肃代之际中书令“退出中枢”奠定了基调。

二、“退出中枢”:肃代之际中书令的职权演变

正是由于开元、天宝年间中书令在朝堂拥有“首相独重”的特殊地位,才导致担任中书令一职所需资望越来越高,欲拜相成为中书令者必须具备丰厚的政治资本或有强硬的政治手腕与对手进行权力博弈。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却彻底打破了这一进阶途径,在肃宗灵武草创的过程中,已经无人具备丰厚的政治资本可以进位中书令,肃宗朝廷的人事安排发生了全面的变化,而原本位高权重的中书令也由此逐渐“退出中枢”。

(一)肃宗朝逐渐“边缘化”的中书令

从肃宗即位后的朝廷草创,到代宗平定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体制的全面革新,其人事安排都是主导这一时期朝政格局的关键因素。但是,纵观肃、代两朝中枢的人事安排,能发现一些巧妙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中书令一职长期悬而不置。一般而言,朝廷的草创都需要重臣的全力辅助,对朝臣职衔品级的授予自然是越高越好,至少能起到聚敛人心的作用。在肃宗的灵武朝廷草创之初,杜鸿渐为兵部郎中,为从五品上衔,崔漪知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衔;裴冕为中书侍郎,全无所谓三省最高长官之置。到了至德二载(757)克复西京以后,肃宗法统已定,在其大赦天下时,中书令才得以再次进入朝廷中枢的视野。《旧唐书·崔圆传》载其“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不过到了第二年五月便被“罢知政事”,从至德二载十二月拜中书令到乾元元年五月去职,崔圆担任中书令前后仅半年时间^{[2]3279}。崔圆担任中书令是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合理性的,从资望与任前官职而言,崔圆在玄宗幸蜀后深受赏识,“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2]3279}。崔圆的仕宦经历是符合玄宗朝“旧例”的,即拜中书令者需要加同平章事衔。不过史书中并未载明崔圆对肃宗朝廷的政治影响究竟如何,而从他短暂的任职经历来看,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不如玄宗朝的姚崇、张说、李林甫等诸相。

至德初期,由于情况特殊,肃宗朝廷无人担任中书令,原本应由中书令主持朝廷政务的那部分职能也逐渐空缺。肃宗为了弥补因悬置中书令而造成的朝政问题,逐渐起用中书侍郎或六部尚书等品级相对更低的官员加同平章事衔,以主持朝廷政务,而这些官员的实际治事能力也为皇帝所认可。如此,朝廷中枢的要员以资望较浅、品秩较低的官员加同平

章事成为惯例,中书令的职能被中书侍郎加同平章事衔的宰相所取代,以往位高权重的中书令反而成为奖赏功臣的勋爵。以崔圆为例,他曾“知剑南节度留后”,在玄宗幸蜀前就“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深得玄宗器重,被提拔为剑南节度使,后随房琯等人赴肃宗行在^{[2]3279}。如此看来,崔圆的确有功于上皇,也在肃宗朝廷草创之际进入中枢,能在西京克复后“以功拜中书令”。尽管此时,崔圆所任中书令仍能在朝廷中枢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中书令被逐渐“边缘化”为奖赏功臣的勋爵的趋势已逐渐明晰。

到乾元元年(758)八月时,“以郭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9]7178},这在中书令和侍中地位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仔细梳理在此之前郭、李二人在平叛战场上的表现,便不难理解肃宗此举之意。郭子仪在至德二载十月大败叛军,“奉广平王入东都”,乾元元年(758)七月又“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以献”^{[2]3452}。而李光弼在至德二载在太原以不满万人对抗史思明、蔡希德等十余万众,并且“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2]3305},严重挫败了史思明等人的攻势。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唐廷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功勋最高的将领,此时给他们加三省最高长官衔确实能起到奖励功勋的作用。此外,上元元年(760)正月,“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9]7209}。宝应元年(762)十二月,为奖赏仆固怀恩父子追剿史朝义的功勋,“仆固怀恩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副元帅”^{[2]271}。至此,唐廷将中书令作为勋爵以赏赐功臣的趋势已基本定型。

(二)代宗初年制度调整下的中书令

肃代之际,朝臣担任中书令的情况已逐渐成为特例,中书令作为奖赏勋爵的趋势开始定型。除了对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三人加中书令外,还有一例尤其值得注意,即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762)五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余如故”^{[2]268},这是唐朝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为宦官加中书令衔的情况。李辅国加中书令衔与肃代之际皇位更迭关系密切,正是由于他在肃宗晚年的宫廷斗争中选择拥护太子,积极铲除张后一党,所以才成就他的“翊戴”之功。出于对李辅国的感激,代宗不仅给其位列三公的头衔,还进号“尚父”^{[2]268}。此时的中书令并没有完全剥离于朝廷政务之外,尚有一定的政务处理权,以至于李辅国骄横跋扈,甚至对代宗说出了“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2]4761}的话语。李辅国的骄横注定了他的败亡,史载“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不久便被罢免了中书令一

职^{[2]4761}。此后,中书令一职不再轻易授人,任中书令者皆为朝廷功勋之臣或地方节度使的勋爵,并无实际职掌。

到了代宗大历二年(767)十一月,朝廷下诏将中书令与侍中升为正二品衔^{[2]288}。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这恐非一次简单的品秩调整。首先,唐廷财政匮乏,无力以钱帛赏赐勋爵,只能通过加官的方式来笼络戡乱功臣,这是相对有效的办法。其次,中书令与侍中虽然品秩相同,但就开元、天宝之际形成的历史传统而言,中书令的地位已高出侍中许多,中书令在中枢政局中独特的地位与郭、李以及仆固等人在平叛战争中的不世功勋更加匹配。这种现象是肃宗以来战乱频仍的必然结果,《通鉴》载“是时府库无积蓄,朝廷专以官爵赏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唐朝职官体系的紊乱,“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9]7141-7142}。这诚然是唐廷面对重重困境的临机应变之举,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却将此临时性举措变成常态化政策。大历二年的诏令,就是从职官制度的层面对肃宗以来“名器之滥”的调整,也标志着自肃宗灵武草创之后,唐廷的中枢政局与制度体系得以革新。

代宗即位以后,朝廷政局几经风波,从平定叛军、光复大唐到銮舆播迁、出幸梁州。代宗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复杂程度完全不亚于肃宗时期,原有的行政体系是否还能够适应新的政局,是代宗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经过肃宗一朝的变动与调整,中书令的职权已完全被中书侍郎加同平章事衔的宰相所侵夺,中书令只能“退出中枢”。代宗出于笼络有“翊戴”之功的李辅国而加中书令衔的举动,也恰是制度调整期的一次尝试。代宗尝试的结果便是李辅国愈加骄横,他险些成为宦官手底下的傀儡皇帝,故而代宗决定不再轻易将中书令一职授予朝臣。与此相应的是,在朝廷之外,有一大批地方节度使等为唐廷平定叛乱立下功勋,财政匮乏的代宗朝廷只能将中书令作为勋爵进行赏赐。更重要的是,当中书侍郎侵夺中书令职权后,原本正三品衔的中书令便出现“悬空”,代宗为了解决这一职官体系的混乱问题,将中书令升为正二品衔,中书侍郎则对应升为正三品衔。这样,中书侍郎即使不加同平章事衔也依旧能主持政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决了官品混乱问题。此外,作为勋爵的中书令品秩提高以后,更达到了笼络朝外功臣节度使的目的。

三、“权力博弈”下的人事安排:中书令职权演变的政治背景

从“首相独重”到“退出中枢”,中书令在唐朝肃

代之际的职权演变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尤其是肃宗朝的人事安排,对这一时期中书令的职权与地位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肃宗灵武草创到收复两京,肃宗的政治地位不断稳固,也逐渐摆脱太上皇对其施加的政治影响,其人事安排也在逐渐变化。肃宗朝廷人事安排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中书令“被迫”退出中枢,经过代宗时期的制度革新,中书令作为赏赐功臣的勋爵这一惯例得以稳定下来。

(一)“二元”格局下玄宗对肃宗朝廷的人事干预

唐肃宗于灵武即位后,首先需要建构起自己的政治班底,让拥立自己即位的朔方将领入主中枢。在肃宗的即位制书中,“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鸿渐为兵部郎中,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243}。这样的人事安排不难看出肃宗朝廷草创时期的捉襟见肘,就连基本的人员班底都无法凑齐。造成肃宗朝廷如此被动的局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冲击,朝廷官员或四散而逃,或随上皇入蜀;但更重要的是成长于非实体化东宫体制^{⑤[5]172-214}中的太子李亨无法调动本就相当有限的人事资源为新朝服务。而到了至德元载(756)九月,韦见素等人自蜀郡而来,这对唐肃宗而言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考验。首先,唐肃宗面对韦见素等人奉上宝册,以“中原未靖”为由坚辞不受,无疑在这群玄宗旧臣的面前表现出了自己以天下为任的决心。其次,面对这群玄宗旧臣,肃宗的态度也非常鲜明,《通鉴》载“上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琯名,虚心待之”^{[9]7116-7117}。无论是对韦见素的厌恶还是对房琯的重视,面对玄宗安排“传位”的这帮大臣,肃宗也将其完全吸纳到了自己草创的朝廷中枢里。这一方面扩大了肃宗的朝廷班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助肃宗应对平叛时遇到的各种行政问题;另一方面,这帮玄宗旧臣甘愿服务于这个草创的朝廷机构自然是玄宗的授意,其对肃宗朝政的干预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逐渐摆脱玄宗干预后的肃宗朝人事任免

从至德元载(756)九月开始,韦见素、房琯等人进入肃宗朝政中枢,表明玄宗对肃宗朝廷取得了有效的干预,而这一局面随着平叛战场上捷报频传而逐渐被打破。至德二载(757)二月,郭子仪败崔乾祐于潼关,收复河东郡,这标志着唐朝平叛军队的力量已经逐渐扩展至长安周围,收复京师近在眼前。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永王璘兵败被杀,这更是玄、肃二

帝中枢矛盾易势的关键转折点^{⑥[6]373-433}。所以三月到五月间,肃宗先后对韦见素、房琯加以荣誉职衔,“罢知政事”^{[2]246},这是肃宗即位以来对朝廷人事安排首次做出较大幅度调整,也可视之为唐肃宗决意摆脱玄宗人事安排做出的重要尝试。关于房琯在肃宗朝廷的任免,《通鉴》中的记载颇值得玩味。首先,房琯于至德元载(756)九月奉宝册到达顺化与肃宗相见时,肃宗对房琯是非常重视的,而房琯“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诸相拱手避之”^{[9]7117}。到十月的时候,贺兰进明向肃宗进言,指陈房琯“尚浮虚”的问题,并且直言房琯曾佐上皇的事实,无疑直接挑明了玄、肃二帝之间的矛盾,于是肃宗对房琯逐渐疏远^{[9]7120-7121}。紧接着便答应房琯“将兵复两京”的请求,但是房琯所选参佐“皆书生,不闲军旅”,在咸阳陈涛斜之战中大败于贼将安守忠,肃宗大怒,得李泌营救才未遭处置^{[9]7121}。虽然表面上看房琯并未因此遭受任何处置,但此次战败已经给肃宗日后替换房琯留下了充足的借口。

随着韦见素、房琯二人相继被“罢知政事”,唐肃宗便渐次起用了已经致仕的前宪部尚书苗晋卿和谏议大夫张镐接替韦、房二人的工作^{[2]246}。这里有必要对苗、张二人的身份做一些分析,才能了解肃宗此番人事替换的目的所在。苗晋卿在开元、天宝年间已久任要职,且颇有声望。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避免为贼军所掳,苗晋卿“潜遁山谷,南投金州”,才被肃宗起用,拜为左相^{[2]3350-3351}。苗晋卿不陷贼庭的高贵品质是肃宗起用他的首要原因,这在肃宗朝廷着力收复两京的战斗中的确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而苗晋卿在前朝所积累的政治声望也恰好能够增强天下军队对肃宗朝廷的政治认同,能收一举两得之效。张镐在玄宗朝任左拾遗,扈从玄宗入蜀,后被玄宗安排赴肃宗行在^{[2]3326-3327}。表面上看张镐是玄宗安插进肃宗朝廷的班底,但实际上张镐仅从八品上的左拾遗衔,实在无法像韦见素、房琯这样的朝廷大员能对肃宗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相反,张镐进入肃宗朝廷后,“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3327}。说明张镐是凭借自身的政治能力获得肃宗信任而被拔擢的,这也是肃宗企图摆脱玄宗政治干预的重要步骤。

唐肃宗积极重建朝政格局的同时,也调动各方军队协同作战,同时求援于回纥,终于在至德二载(757)九月收复西京^{[2]247}。这对肃宗朝廷而言具有转折性意义,收复西京不仅标志着肃宗灵武即位的

初心得以实现,更增强了朝野对肃宗朝廷的政治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当初玄宗“传位”的制书中明确指出“伏克复两京,朕不复预事”^{[9]7111}。至此,玄宗对肃宗朝政治干预的合法性已经彻底结束,肃宗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崭新的政治班底,不再受制于玄宗。

(三) 肃宗朝廷全面调整中枢班底与宦官乱政

克复长安后,十二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授上传国玺,上于殿下,涕泣而受之”^{[2]250},这标志着“二元政治”格局彻底结束,唐肃宗获得了完全的“法统”,肃宗朝廷的合法性最终确立。乾元元年(758)五月,肃宗进一步对中枢班底进行调整,崔圆和李麟“并罢知政事”,以王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玙任相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年,到乾元二年(759)便与年事已高的苗晋卿“并罢知政事”。同时,肃宗起用了一班全新的人才进入中央,史载其“以京兆尹李岷为吏部尚书,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与户部侍郎第五琦等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255}。对于肃宗而言,这个班底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协助肃宗从人事、礼仪、财赋等三个方面恢复朝政运行。但此时朝廷的中枢政局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肃宗虽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构建了全新的政治班底,但是这个班底的运行却遭到了来自宦官集团的打压,李岷便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史载“上于岷恩意尤厚,岷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岷”,胡三省在本条下有注曰“为李辅国忌岷,不得久于相位张本”^{[9]7191-7192}。李岷备受肃宗宠信,常在肃宗面前“谕制敕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9]7193},所以当年五月,就被贬为蜀州刺史。

肃宗时期被李辅国排挤出中枢政局的远不止李岷一人,乾元元年(758),李麟因“正身谨事,无所依附,辅国不悦”便被“被罢知政事,守太子少傅”^{[2]3339}。除了贬斥忠臣外,李辅国在肃宗一朝专权跋扈的行为非常明显。首先,李辅国加开府仪同三司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此外,李辅国还对太上皇甚为不礼,“矫诏移上皇居西内”,使太上皇的处境更加窘迫^{[2]4760}。由于李辅国是肃宗的扈从功臣,肃宗对李辅国专权跋扈的行为并不加以限制,以致李辅国和张皇后相互勾结,到肃宗晚年甚至参与到内宫争斗,险些酿成宫廷政变^{[9]7244}。

唐肃宗与玄宗进行“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起用资望较浅、品秩较低的官员加相衔以行宰

辅之事,主持朝廷政务,这就在实质上完成了原本由中书令担任的工作。此外,肃宗朝廷人事变动的过程中还体现出宦官对朝政的干预,李辅国多次排挤朝廷重臣,成为唐朝宦官专权的先河。代宗即位以后诛杀李辅国恰恰阻断了中书令职权延伸至宦官体系的可能,中书令彻底成为赏赐戡乱之臣、权重一方的节度使的“勋爵”。

四、结语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促成了唐朝职官制度的深刻调整。一方面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催生了大量的使职官员,另一方面朝廷原本的职事官也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退出中枢”。中书令在唐朝肃代之际的职权演变就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职官体系演变的一个例子。开元、天宝年间的中书令不仅地位崇高,而且在朝堂中有足够的话语权,玄宗也必须慎重考虑中书令的意见,中书令俨然成为“众相之首”;另外,玄宗时期中书令的地位上升伴随皇权加强得以体现,因此玄宗时期中书令也必须服从皇帝意志,这也就造成了开元、天宝时期朝臣之间斗争不断的现象,为玄宗朝政治的腐败以及安史之乱的爆发都埋下了隐患。肃宗灵武草创以后,朝廷中缺乏资望可以担任中书令的官员,遂以中书令之副贰中书侍郎加同平章事衔处理政务,这些中书侍郎实际处理政务的惯例被延续下来,中书令在朝中自然也没有办法发挥实际职能,因此肃宗朝只有崔圆担任过几个月的中书令。与中书令“退出中枢”相适应的是,朝廷为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平定安史叛乱的功臣加中书令之衔,中书令作为勋官赏赐功臣的趋势逐渐明晰并且成为唐朝后期的政治传统。代宗即位以后,先对有“翊戴”之功的宦官李辅国加以中书令之衔,但此时的中书令尚有一定的权力,李辅国愈加肆无忌惮甚至直接处理朝政,后被代宗诛杀。此后,中书令再也不轻易授予朝臣,代宗诛杀李辅国也杜绝了尚且保留一定权力的中书令向宦官体系的蔓延。大历二年(767),代宗下制调整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品秩,一方面既满足了朝廷对功勋之臣进行表彰和嘉奖的需求,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也成功解决了中书令“退出中枢”以后实际处理朝政者品秩较低的问题。代宗大历二年的官品调整是唐朝职官体系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唐朝肃代之际中书令职权转换完成的标志。

注释:

① 刘后滨对唐朝中书门下体制的研究尤为系统,对唐朝三

省的地位变迁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济南:齐鲁书社,2004.

- ② 任士英研究玄宗朝中枢政局时也认为玄宗时期中书令地位崇高,对皇帝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4.
- ③ 黄永年先生从肃宗灵武分兵讲起,对肃代两朝的中枢政治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参见黄永年所著《肃代两朝中枢政局》,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6-367页.
- ④ 表依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中的帝王本纪、大臣传记等部分并辅以《资治通鉴》整理而成,兹不赘引.
- ⑤ 任士英对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非实体化东宫体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天宝年间东宫官基本成为闲散官员,或成为地方官和方镇衙将的加官,无法履行像唐前期东宫实体体制下赞辅皇储的任务.参见氏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172-214页.
- ⑥ 李碧妍对永王之乱有深入的剖析,认为唐玄宗任命永王东巡其实就是为了制衡肃宗的灵武朝廷,而肃宗积极谋划平定永王之乱就是要掌握江淮地区的财赋,这一事件是玄、肃二帝中枢矛盾白热化的体现.参见李碧妍.危机

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73-433.

参考文献:

- [1] 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济南:齐鲁书社,2004.
- [5]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4.
- [6]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
- [7] 王凯,辛志英.唐代深州张鷟家族士人心态及作品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7):39-40.
- [8] 黄大宏,梁明玉.唐人常袞诗文集署窜乱及伪作辨正:兼说卢纶诗误署常袞的讹误[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5)29-35.
- [9]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

From Substantive to Nomin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Zhongshu L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mperor Suzong to Daizong in Tang Dynasty

HUANG B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reigns, *Zhongshu Ling* (the Chief Secretary of the Secretariat, ZSL) with exceptionally high political prestige enjoyed great favor and trust from the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Dynasty and effectively acted as a prime minister in handling state affairs.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 (755-763),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urt of Emperor Suzong lacked individuals of sufficient prestige and status to appoint as ZSL. Consequently, state affairs were managed by *Zhongshu Shilang* (Vice Secretary of the Secretariat) granted the title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refore, the ZSL gradually marginalized in the court. Concurrently, distinguished ministers, like GUO Ziyi and LI Guangbi, were successively awarded the title of ZSL which then gradually became an honorary title. The adjustment of the ranks of the *Zhongshu* (Secretariat) and *Menxia* (Chancellery) headed by Emperor Daizo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Dali (767)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ZSL's role from a central to a peripheral posi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ZSL's authority from substantive to nominal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mperor Xuanzong to Suzong and Daizong is demonstrated in the central court's personnel arrangements following Emperor Suzong's ascension. The evolution also results from continuous power struggles and adjustments of political system by the courts of Suzong and Daizong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e transition from Emperor Suzong to Daizong; *Zhongshu Ling*

(责任编辑: 龚小凤)